



EJ095198713167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 13 期 民國 76 年 3 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13, March 1987

## 地理學方法論中的非實證論傳統\*

### The Tradition of Ab-Positivism in The Methodology of Geography

潘 朝 陽\*\*  
Chao-yang Pan

#### Abstract

Traditionally, geograph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branch of the so-called "positive science", and as such geography is held to abide by such rigorous scientific inference procedures as hypothesis; collectio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verification, establishment of model, and consequently forecasting based on conclusion. Geography derived accordingly is referred to as 'scientific geography', the philosophy underlying known as 'positivism'.

The progress of natural sciences which has been advancing vehemently in our times has considerable impacts on the philosoph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positivism has become an emerging trend for methodology, calling for th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model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phenomena with a view to find out universal law accountable for all that is seen and that which prevails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a everywhere worldwide.

Way back following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during the 60's and the 70's, Geography for study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ories like positivism and logical

\* 當代國內專文論述地理學方法論的學者多有，其中如沙學浚、陳正祥、石再添、周春堤、陳芳惠、鄭資約、嚴勝雄、施添福、陳文尚……等教授各有引介及建樹地理學方法論的積極貢獻，本文寫作承襲前賢之處甚多，不敢掠美，特此申明，特別是嚴施兩位教授一系列關於地理思想的論著，長久以來給予作者深遠的啟發和影響，而本文觀點有許多源自嚴勝雄教授的論著，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ositivism, a lot of spatial 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heses on the subject of geography came up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strong backgrounds of math and physics, especially geometrical spirits, as reflected in the points, segments of line, and surfaces characterising geographical setting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an ab-positivism philosophy which has been prevailing and outstanding enough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be it 'Romanticism', 'Neo-Kantianism', 'Historicism', they altogether run contrary to 'Naturalism', 'Materialism', 'Empiricism', and even 'Positivism', any that which favors 'Mechanism', they opposed researching, handling of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 by means of natural science in one way or another, but instead they advocated 'cultural historical sciences', with stresses given to humanitarian value, individual meaningfulness, and as such they can hardly agree with the pursuit of the so-called 'universal law', they proposed instead that the target set for humanitarian and sociological subjects should be to uphold the meaning of 'human being'.

In as early as days when Ritter became prominent, for geography a branch of study, methodology, unrelated to positiv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a series of geographic thoughts including those propounded by Schlüter-Carl Sauer,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Hettner-Hartshorne, were aimed at illustrating the meaning of "Regional Uniqueness" through interpretative expression the philosophy behind all these is obviously other than positivistic in nature. In short, their philosophy openly and unanimously oppose the pursuit of a universal law as the goal for geography, and prefer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Regional uniqueness by means of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heritage of th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philosophical influence of Neo-Kantianism, Historicism, and even Romanticism can be found by means of their methodology.

## 一、前　　言

近代地理學，自十九世紀在歐洲源起並逐漸發展以來，一般將其看成一門不折不扣的「實證科學」( positive science )。所謂「實證科學」是指以自然科學或經驗分析科學的方法論為唯一的科學方法，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的地理學乃是遵循「提出假說，收集、評價、分析資料，驗證假說，建立模式，並依據結論從事預測」等一連串所謂「嚴格科學」的推理程序而完成其知識的架構和內容。

這樣的認知，十足是「實證論」( positivism )的態度，服膺上述論點的學者們固然以為地理學不像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等擁有明確的研究對象，但却跟自然科

學一樣，都是採用同樣的科學過程以獲得知知識<sup>1</sup>。如同孔德（Comte）的見解，他們預設了自然科學至上論和科學一元論，亦即以人類的文明發展至科學為極至，而科學中以數學、物理學為登峰造極，研究人文現象無有他途，與研究自然現象完全一致，方法固然相同，其目的也均是「普遍法則」的獲得，並以此「普遍法則」作為預測、制變社會的工具。

地理學者一般地、泛泛地以為地理學是一門實證科學，一方面是由於地理學萌生之際，事實上多有自然科學，如地質學、博物學、生物學、氣候學……等專家轉而建造了自然地理學<sup>2</sup>；而由於這些自然科學的先天性之「經驗論」（empiricism）、「實證論」的脈絡，致使地理學一直便在其血液中含有經驗的、實證的質素，另一方面則乃因為十九世紀以降，在西方思潮中，恰逢經驗論、實證論佔有顯學優勢，而地理學方法論受其侵浸的緣故。

論及西方近代實證科學的思潮發展，應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紀，並且延續到十八世紀而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最根本信念是賦予人類的「理性」以絕對的能力，以為依賴「理性」，人類得以建立科學，由理性科學的引導，終可建設一個理性秩序的社會。此種信念其來有自，特別在下列幾位重要大師影響下而展開：

(1)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他認為運用基於感官經驗的歸納法，才可客觀合理地說明自然世界的秩序和律法，人類才得以排除主觀主義、以偏概全、人云亦云、盲從權威等各種「假相」。培根強調科學應與方法聯接，他說：「科學的真正目標，乃為方法的法則化。」他將觀察者與被觀察者加以區分，把人「中立化」，相對地凸現知識的「客觀」。

(2)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他把自然與人分開，不再採用從外部思想思辯的傳統方法，而採用解剖分析自然的方法，發掘自然的內部，然後分析現象，加以單純化、數量化，並選出假說，經人為的反復確認，而以數學形式表現之。這種方式即是以計量來表達自然法則及其客觀性。他說：「自然乃是以數學語言所寫下來的偉大書籍」。

(3)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他對人類的理性有絕對的信心，堅信人類能夠建構清晰嚴謹的數學體系，並確信非心靈的實體均可透過理性而被化約

<sup>1</sup> 石再添、施添福，「地理教學與科學教育」，明日的科學教育，頁469-490，幼獅文化事業出版公司，73年6月

<sup>2</sup> 近代地理學的開創性人物大多具備自然科學的素養，而有些甚至只專攻自然地理學以及與自然地理學密切相關的自然科學，如地質學、地形學、植物學、生態學等，譬如洪保德、白契爾、達爾文、戴維士、赫克兒……等均屬之。

爲純機械的概念（如位置、運動等），並給予計量的說明。對他而言，人類思維法則（理性）與外在實體法則（數學）是具有相對應的關係的。

(4)牛頓（Isac Newton, 1643-1727）：他的力學發現了普遍性地說明機械運動的數學方法（或物理法則），它可以普遍地、簡約地說明自然世界的運動，並且可以正確地預測未來。因此驅使後人長期去探索「說明宇宙本質的法則」。「萬有引力說」提出之後，遂奠定了以計量爲方法的機械論之鞏固基礎。

以上所述諸大師的思想爲「啓蒙時代」鋪設了康莊大道，從笛卡爾，啓蒙者堅信主體的思維意識具有掌握外在世界實在性的能力，從牛頓，他們瞭解，既然世界服從力學規律的支配，那麼社會也應與「自然」無有殊異，應具有一合理的秩序可被人掌握。因此，社會歷史進步的關鍵，乃在於不斷經由理性的運作，透過感官經驗的檢證，必能排除種種偏見和假相而獲得普遍性的法則，進而達到合理秩序的社會<sup>3)</sup>。

基於上述思潮的推演，十九世紀以來，有一股強盛的思想方法論的勢力持久不衰，此股勢力主張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引用到社會科學，並認爲社會科學也具備與自然科學相同的條件，因此應以自然科學的模式來處理社會科學的對象，彼等有意無意地將社會「自然化」地看待了，僅視人類爲自然世界的一分子，社會、歷史被溶入機械式、物理式的過程中，以實驗科學爲基礎，用物理學法則來進行人文現象的判準，而且運作過程趨向於數量化，易言之，社會科學的終極目標即是抽象化、純理化的法則模式的獲得<sup>4)</sup>。

以上所論，實則爲實證論的基本概念，簡扼言之，此種思維方式具有下列陳述的基本精神：(1)以經驗觀察的方式建立知識，(2)在社會科學中發展出自然法則，(3)法則提供預測，(4)預測用以改變人文社會<sup>5)</sup>。

秉持實證論的精神，並且結合了經驗論的哲學理念，而發展出「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sup>6)</sup>，其觀念影響二戰之後的地理學方法論甚巨。關於邏輯實證論，具有下列基本精神：

(1)排除「形上學」：形而上學主張超越於現象世界之外有一「實相」（或「實體」）存在，此超越性存在的實體爲真、爲本；而現象世界爲幻、爲末。邏輯實證論從根本否定形上學的真確性，因爲形上學無可檢證。相反地，邏輯實證論完全建立在經

<sup>3)</sup> 以上陳述根據：嚴勝雄，「科學發展與空間科學的因應」，都市計劃第九卷第一期，頁19-36，72年，李英明，「哈伯馬斯」，頁82-83，東大圖書公司，75年。

<sup>4)</sup> 嚴勝雄，「科學之發展及其面臨之問題」，文藝復興月刊140期，頁15-28，72年。

<sup>5)</sup> Johnston, R. J.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pp. 11-12, 1983.

<sup>6)</sup> 趙雅博，「西方當代哲學」，頁373-374，正中書局，63年。

驗和知識上，它只接受經驗事實為檢證知識的唯一標準。

(2) 檢證原則：科學和實證概念乃是建立在一個經驗的假設上面；即所謂「事實性的命題」必須透過假設的檢證，經由經驗事實的驗證者才為「真的命題」，否則為「假的命題」，後者即是所謂「無意義」者，譬如「形上學」；而可以被檢證的，所謂「真的命題」，經由正證 ( verification ) 或否證 ( falsification ) 得出正確命題或錯誤命題之結論。

(3) 實證科學的目的在於「法則」的建立，亦即「普遍化命題」的建立，此「普遍化者」乃用以說明「現象」。

(4) 科學的方法須是「假設演繹法」 (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由一個假設開始，經過經驗的、演繹的方式而形成法則，然後由法則構成「理論」<sup>7)</sup>。

邏輯實證論者堅持只有一種科學的方法和理路，人文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並無二致，目的也無差別。當然，計量化乃成為基本的技術用以建構模式。

將邏輯實證論的哲學引進地理學，建立了實證論的地理學之方法論者為雪弗 (P. K. Schaefer, 1953)。在題為「地理學的例外主義」 (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 一篇論文中 ( 此文印於雪弗去世之後 )，雪弗提舉「邏輯實證論」的大纛以抨擊哈子宏的地理學方法論。事實上，雪弗是在攻擊由赫特納到哈子宏一脈所代表的科學觀念；哈子宏所主張的地理學應研究區域獨特性的觀點，遭受雪弗全面的否定，他認為地理學應被看成是與其他科學一樣，必須追求「法則」並以「法則」達到說明地理現象之目的，在他而言，地理學的研究目的即是尋出現象的空間形態、空間安排、空間過程……等關於空間結構之模式或法則<sup>8)</sup>。

雪弗之後，在英美地理學界急劇地發展出以邏輯實證論為哲學基礎的，所謂的「空間科學的地理學」 ( Spatial science geography )，在一九六〇年代萌芽、茁壯，在七〇年代達至炫赫巔峰之境，如英國的 Chorley, Haggett, Harvey 和美國的 Ullman, Garrison, Bunge, Morrill……等人均是個中之精英俊彥，彼等強調法則、模式的建構，理論的追求，計量的使用，這一切均是為了說明具有「普遍化」作用的空間系統<sup>9)</sup>。自從此派思潮興盛之後，表現地理現象之點、線、面形式的所謂「空間科學」地理論文大量問世，而使地理學的內涵一時之間顯露著強烈的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味道。

在「空間科學」的推波助瀾之下，實證論的地理學方法論益發顯著優居顯學要津

<sup>7)</sup> 同注 5 , PP . 12-20.

<sup>8)</sup> Johnston, R. J.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pp. 42-44, 1979.

<sup>9)</sup> Johnston, R. J.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pp. 49-111, 1979.

Paterson, J. L. "David Harvey's Geography," PP. 20-22, 1984.

之勢。然而，如果能夠回溯地理學的歷史發展，並且能夠以深挖伏流的方式，其實可以拓現出一直未曾中斷，而只是隱伏的另外一種地理學方法論的傳承；該種傳承不僅有別於實證論到邏輯實證論的路線，甚至是立基於相對立的立場，而特具有內涵和意義。而此兩種方法論的分別，事實上牽涉了哲學理念的歧異。本文的目的便是從西方近代反實證論的思潮之釐清開始，進一步詮釋幾位重要的地理學大師的方法論，用以表彰地理學研究進路中一種深值珍貴的精神。

## 二、反實證論、非實證論之思潮

如前所述，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降，近代西方依理性所建立起來的實證科學思潮大佔勝場。此種以自然及其法則為知識典範與行為形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存有化約主義的傾向<sup>10)</sup>。尤其笛卡爾系統性地把伽利略等一系列重要自然科學家的特殊思維方式建構成主體主義的客觀主義，而使啟蒙時代之後的西方思想進入實證論的時代<sup>11)</sup>。再加上自然物理科學的闊步昂揚，大勢所趨，十九世紀西方主要思潮是立基於一連串由自然、物理科學而來的體系，如：唯物論、演化論、實證論等；均只認為知識的標準唯是科學，而且是機械論式的科學<sup>12)</sup>。緣此而使十九世紀以來，許多人文學科的工作者只知師法自然科學的「科學性」，一心致力於所謂「普遍性法則」的追求，却忽略了人文研究的特殊意義，並逐步造成「人文世界」的價值意義在人心中嚴重失落的危機。有基於此，乃激發許多具有人文主義胸懷者挺身而起，強調人文科學有其特殊性質，大不同於自然科學，不可化約為自然科學的附庸，彼等強調應闡釋、攝握活生生的個人、社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而不齒於自然科學化約主義的雷同化、機械化、虛無化的趨向<sup>13)</sup>。

這種反實證論、非實證論思潮，早在啟蒙時代末尾，即十八、九世紀之交，便已油然蔚起，迄於今日，其勢愈顯雄渾。在本章中，擬依歷史脈絡予以簡要解釋：

### (一) 關於「浪漫主義」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心態，主要是邏輯數學取向的理性，廣泛言之，是理智主義的理性。此種心態欣趣於牛頓建立起來的靜態之機械式宇宙，其最大特色正是要以冷

<sup>10)</sup> 沈清松，「科技發展之人文意義」，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對文化的衝擊與展望，頁200-226，時報出版公司，73年8月。

<sup>11)</sup> 杭之，「反省五四思想的一點意義」，中國時報第八版，75年5月5日。

<sup>12)</sup> 波亨斯基，「當代歐洲哲學」，頁5，郭博文譯，協志工業叢書，75年5版。

<sup>13)</sup> 同註10。

冷然的唯理心，透過純理的數學邏輯，化繁瑣的實在而為簡約的概念，由此把捉住宇宙的永恒性規律或定理。此種唯理心之思維過份重視思想和表現方式的簡單化與明瞭化；特別是偏向形式、法則的追索，喜歡把一切化為抽象性、普遍性的概念式之存在，相反地，豐富複雜的實在界則被視而不見<sup>14)</sup>。

大約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乃有一批思想家帶動了一股反動的思潮，被稱為「浪漫主義」，基本上，彼等批判理智或理性主義者忽視了人類和自然界的神秘性、奧妙性和複雜性；也漠視了人性的深邃性、無限性及其創發性。浪漫主義者最厭惡理性主義抽象式、普遍化概念下的世界觀，彼等認為經由量化、機械化、形式化的世界，已然是抽離了實存的虛假之物。彼等主張經由心靈的直觀和逼真的感情，才可望欣賞人文和自然界的形形色色，也才能攝握實在世界的多采多姿。簡言之，浪漫主義反對唯理主義，彼等要依心靈的直觀，從具有抽象性的知性以及外在的機械系統收回來，而深入到「生命的主體性」；重視的是生機洋溢的個體，反對的是所謂「模式」<sup>15)</sup>。

## (二) 關於「新康德主義」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哲學建構了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1781)，「實踐理性批判」(1788) 和「判斷力批判」(1790)。在第一批判裏，康德處理受嚴格的因果法則決定的物理世界問題，他認為自然物理世界，受嚴格的因果法則支配，這方面的知識之所以可能，乃是先驗主體從一大堆雜亂的經驗素材中建立的綜合結果，換言之，人依其純粹理性的運作，透過邏輯、數學、自然科學定律以說明外在的物理的世界。在第二批判中，康德主張人除了存在於自然世界之外，也同時存在於意志自由的道德領域；人的道德意志自由的世界，不受自然法則支配，而是遵循人的自律、自決，依賴人自身的價值判斷<sup>16)</sup>。

易言之，康德預設了兩元的世界存在，一是自然物理世界，一是人文世界，對於前者，主張因果法則之追尋為知識進路；後者則含有意志道德實踐性之選擇及判斷的問題，不受自然法則之支配。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康德哲學衍生為七個分支，統稱為「新康德學派」。一八七〇年之後的派別放棄了康德哲學中隱含的自然主義，而強調心靈的先驗向度，基本上

<sup>14)</sup> 這種「顛倒」，學者批評為科學之「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其後果往往是摧毀了人文精神，將人帶入「物化」的絕境。見：成中英「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頁1-28，三民書局，63年4月。

<sup>15)</sup> 牟宗三，「人文主義的完成」，道德的理想主義，頁158-185，學生書局，67年修訂三版，伊斯頓 (Easton, S.C.)，「西洋近世史」第二冊，頁211-231，李邁先譯，幼獅書店，63年再版。

<sup>16)</sup> 張旺山，「狄爾泰」，頁56，東大圖書公司，75年。

是以「觀念論」( Idealism) 的立場反對實證論。這裏包含「馬堡學派」和「巴登學派」。茲敍論兩派觀點：

### 1. 馬堡學派

馬堡學派發展康德的「構成主義」理路，倡導動性的純粹（學的）思維之一元論，一律否定概念與直觀或思維與感覺等二元的區別，學問的認知乃是純粹思維「根源地產生」客觀（學的）世界的無限動行過程<sup>17)</sup>。此派的創始者海爾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極為強調思想的能動性，他認為思想不僅決定了感官經驗的形式，也產生了自己的實在，存有不是獨立的，必須呈現於思想中，只有思想能產生存有。換言之，「真」要與理性相一致，理性是先驗的，亦即先驗邏輯乃是人類文化三大領域—科學、道德、藝術的先決條件<sup>18)</sup>。此所謂先驗邏輯作為先決條件，包含著兩方面的要求：①理性或思想的知識活動要踏踏實實地追溯各種實際存在的、有歷史為證的科學、倫理學、藝術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實，面對這種廣義的經驗，努力把根基紮到一切創造文明的活動中去；②要在科學文化的活動經驗中提煉出規律，但並不是從外面強把規律加在經驗上，而是要讓經驗自己確切地意識自身所遵循的規律，以保證創造活動沿恰當的方向前進<sup>19)</sup>。

如上所述，馬堡學派認為一切存有（世界），均需經由人之思想（理性）的「構成」，對人而言，這樣之構成才有實存的意義。所謂知識的成立，就是先驗理性對存有現象的先驗邏輯之掌握和展現，無論自然物理科學、人文學術、倫理道德、宗教、藝術……等均是如此。而既然預設了先驗理性追溯紮根於各種創造文明活動之內；並讓經驗自身意識其規律，於此似乎暗喻著一切存有自有其所循的邏輯或規律，理性思維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時，就是要「構成」其等之先驗邏輯性。關於這方面，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區分自然科學世界的思維乃「事物的感知」；人文學術世界的思維則屬「表達的感知」。卡西勒認為在自然物理科學世界中，只遇到「初性」的客觀實有，從笛卡爾之後，才建構出嚴格數學性和機械性的宇宙理念，此種理念乃是科學不斷求理解和征服自然現象之過程中的抽象產品，人類在此科學推理過程中，從衆多初性實有現象中析離出「嚴格的，不可背離的法則」，而愈來愈要求對一切涉及「位格」者施加壓力，甚至根本地將之摒除於自然物理世界之圖像外，易言之，必須在「我」、「你」的世界被摒除之後，自然科學才認為其已達目的。

與自然科學相反，卡西勒強調人文科學是以處理人文對象為其思維目的；人文對象並

<sup>17)</sup>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頁419，三民書局，73年7版。

<sup>18)</sup> 張旺山，「狄爾泰」，頁102-103。

<sup>19)</sup> 佚名，「當代西方哲學家·歐陸篇」，頁13-16，弘文館出版社，75年9月。

不僅僅單純地「存在」與「改變」；在此「存在」和「改變」中，另有一嶄新的內容由其內部顯現出來，此即「人文的意義」；「意義」的顯現不能化約成物理學的領域，「意義」乃是「文化」的一切內容的共同層面。易言之，對人文世界而言，根本無所謂嚴格、獨立的「事物世界」可說，在此，一切均含涵著深層的、不可理解性的，非素樸的意義內容，而彼等通過各種「表達」展顯出來。卡西勒特別舉出拉菲爾（Raffael）的「雅典之學園」一幅不朽名畫以說明人文思維之有別於自然思維之處，即在於：此幅油畫之深層意義不在於初性實有，如亞麻布、油彩等，而是在於兩層人文意義的表達，其一表達了西方大哲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智慧對話所顯示的文化價值；其一則是大藝術家拉菲爾本人藉其藝術創作而表達出他心靈中深層向度的人文關懷。人文科學的「位格尊嚴」就是在此抉擇和攝握中展顯<sup>20)</sup>。

## 2. 巴登學派

巴登學派（又稱西南學派、價值學派、海德堡學派）從文化整體出發，文化的發展以及歷史研究是他們的主要興趣，在他們眼中，康德哲學決定性的一面乃是「實踐理性批判」，而非「純粹理性批判」<sup>21)</sup>。

此派代表性人物為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以及其後繼者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茲簡敍二人的基本思想於下：

文德爾班由康德哲學中接受人類判斷力有二種運作方式—普遍化、特殊化—的區分之論點，建構出兩元科學論：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兩元；他強調這二類科學的區別不在於對象或內容之不同，而在於方法的殊異。自然科學的特徵在於運用普遍化的方法求取普遍法則，亦即追求對合法則的、普遍的、無時空性的本質的理解，從「特殊」開始上升到「普遍」關係，而其抽象性，由諸全稱必然判斷組成。反之，歷史與其他文化科學的目標則在於詳細描述事物的獨特性、個體性，亦即在於追求對個別性的、時間性的現象或特殊事物的特性，因而具有直觀性，由諸單稱或然命題組成。文德爾班稱前者為「尋求法則的科學」，後者為「描述特性的科學」；對於後者，尤其是其歷史學的內在精神，他認為其目的在於根據文化歷史素材復活過去的真實性，使其生動、明瞭，亦即使各言語、民族，總而言之即各文化之人文世界「重新復活」。

李克特繼承文德爾班的志業和思想，更進一步指出：在自然科學裏，概念被用來組織我們對物理世界的了解，但科學概念却非經驗之完整表達，相反的，在透過抽象的方式形成概念的過程中，事實的獨特性與豐富性被犧牲了，李克特強調科學概念的真正性質乃是物理世界的簡化，而實在界的延續性和異質性，則是物理科學所無法表

<sup>20)</sup> 卡西勒，「人文科學的邏輯」，頁57-75，關子尹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75年。

<sup>21)</sup> 同註12，頁72。

達的。相反地，歷史學以及文化科學則不追求普通法則，而是以個別事物為其對象，目的在於把握並表達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李克特肯定只有獨特的、不可能重現的個體性才具有本身主體性的固有價值；文化科學（或人文科學）的思維對象正是此獨特性的個體，因此其一定且必須是「價值之學」，以表彰「人文意義」為其目的；與此相反，自然科學則是一門「價值中立之學」<sup>22)</sup>。

### （三）關於「歷史的思考」

在實證論心態的影響下，人文學者很自然地傾向於以自然科學的知識模式作為研究人文社會現象時理論建構及經驗進路的模式，因此，在人文社會現象中尋求普遍性法則成為首務。對於那些特定的時空條件下的特殊事件之處理，如歷史學者或區域地理學者所從事的工作，則被視為較低層次的知識活動。

扼要言之，實證論心態的「非歷史的」性格非常顯著。其理論、方法、觀念均從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經過所謂「科學化」、「標準化」的過程，而將原本屬於人文歷史實體之一部份者，如：「結構」、「功能」、「衝突」、「階層」、「流動」、「生活方式」……等源自人文歷史脈絡中的概念，加以「凍結」，成為抽象的、非歷史的形式理念，再反過來用此「凍結」的概念來說明不相同的文化、歷史背景的區域和社會<sup>23)</sup>。在其中隱含著嚴重的錯置之謬誤。

雖然十九世紀以來的實證科學的心態十分強勢，但並非全然在思想學術世界中一統寰宇，與此自然唯物的心態相對，有一些思想者提出「歷史思考」的思維方式，使人文社會之研究進路有別於自然世界之研究進路；亦即前者須是經由「歷史思考」方能了解，而後者則否。十九世紀末葉，德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朵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在其有名的「自然與歷史」一文中提出對於人之思維的二元的看法；他認為人類思維世界時，具有兩個面向，即「自然」和「歷史」。朵伊森認為知識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人是一種「精神」的存在，此「精神」的活動使人自覺自己的存在，使人有意識、有自決的思考及選擇，使人在一個一定的軌道中觀察、思考、前進，使人成為世界的「主宰」。易言之，人的主體性使人具有思維、了解、掌握世界的能力；也唯有通過人的詮釋，這世界對人而言才能成為真實的世界。然而，在其精神活動中，有兩元的面向，其一是為「自然」，另一則為「歷史」；此兩者全然異途。

關於「自然的面向」，主要是在自然世界的繁縝紛雜的現象中尋找「恒常的、變

<sup>22)</sup> 同註 16，頁 105-107。

同註 19，頁 34。

<sup>23)</sup> 高承恕，「布勞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一號，頁 95-134，71 年 7 月。

而不變」的「形態」；而人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觀察研究自然物、去認識其質地、力量，以及定律，並將之分門別類，進一步掌握其「變而不變的恒常性」，其唯一目的乃是為了「運用」，換言之，即是「宰制」，至於自然事物的個別性現象，則無需措意，也非人之能力足以理解者。

與上述相反，關於「歷史的面向」，朵伊森指出人不是獨立中性的「原子人」；人之為人必然落在特定的文化歷史脈絡中，人必須在特定的倫理團體中成長茁壯。由於人文世界乃是由這些文化的、歷史的、倫理團體的人所構成，因此，對於人文世界的思維，會毫不猶豫地強調其現象中「似同而有變」的特色，易言之，對於人文世界之知識建構的目的，並不在於推求其「同一性」、「恒常性」以及因果相關定律，而是在於闡釋彰明人文世界中各種形態的「獨特性」及「延續性」；而此所謂「獨特」、「延續」的個性，乃是由彼等的文化歷史脈絡蘊蓄演衍創化而成，其中正隱含著人之倫理生活的意義，人文思維的進路，就是要將此意義的莊嚴價值彰顯出來，藉以貞定人文世界的存在。基於上述，所謂「歷史的面向」即是意謂：由於人文世界乃是文化歷史脈絡所演衍而生的結構，人在思維人文世界時，便必須依循追溯其延續的時間之流，從其文化歷史的傳承中，展顯出人文世界存在的價值意義；復次，由於在空間向度上，文化歷史脈絡的創生和演化乃是多元的，複數的存在，因此由彼等所建構而成的人文世界，在實際狀態裏，非一全稱式的事體，相反地，由於多元、複數的文化歷史脈絡的發展，於是在地表上開顯出豐富繁茂、多采多姿的區域性獨特內容（國別的、民族別的、城鄉別的、文化區域別的……等），這個豐茂多采的人文世界的區域差異性，也正是人文思維抉擇攝握的中心<sup>24)</sup>。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也區分科學為兩大部門，一是自然科學，一是歷史、文化科學。關於自然科學，韋伯承襲李克特的論點，認為自然科學的型構方式乃是企圖建構一個法則或關係的體系；此體系不斷增進其普遍性，而且儘可能具有數學的性質。其理想形式是牛頓或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或現代核子物理學。在這種科學裏，概念指謂心靈所建構的對象，體系則是演繹式的，從抽象、簡單，而且基本的法則或原理開始。

與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相異，韋伯認為歷史、文化科學的特色並非在於將無定形的材料和現象逐步納入一個數學關係的體系中，而是嘗試將人文材料或現象關聯到「價值」，在現象和材料中建立、展顯「價值的判斷」和「意義的抉擇」。此前提乃是由於人文世界必然是人類在地表上，經由一段時間之流的累積蘊發之後而形成的有意

<sup>24)</sup> 朵伊森，「自然與歷史」，歷史知識的理論，頁 121-132，胡昌智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75 年。

義的創造，此意義地創造出來的實在，具備歷史的傳承和結構，必須透過歷史時間、歷史空間以及歷史的整體性方能掌握，易言之，人文世界蘊含著豐富多采的內在性可理解的意義或價值；歷史、文化科學的思維，乃在於依循並追溯其歷史、文化脈絡，在其中抉發出某一特定社會、時代、區域的獨特性的價值層級或內涵，韋伯強調屬於人文世界中的「某一次現象」，如一個人物、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區域，往往是對人類而言，深具「特殊的意義」，關懷這樣的「特殊性意義」，在人類的文明發展路程中，與「普遍性法則」之追尋一樣重要<sup>25)</sup>。

### 三、非實證論的地理學方法論

#### (一) 洪保德與李特爾的差異

近代地理學兩位開宗立派大師：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固然均一致同意在宇宙或世界上的所有現象均屬一個整合體系的一部份，其運作過程均相互有所關聯。然而彼等服膺的哲學理念和方法論却有明顯的差異。

就洪保德而言，世界現象的源始力乃來自「自然」本身，此中並無什麼「超越、形而上」的根據。由於傾向自然科學的追求與訓練，尤其接受了生物學、地質學、礦物學的薰陶<sup>26)</sup>，促使洪氏完全採取唯物、自然主義的方法以詮釋地理現象，亦即使用自然科學的態度從事研究和創作。他透過經驗觀察法，旅行世界，注目於地表上的自然物理及機體現象，並且予以定量、系統地描述<sup>27)</sup>。

洪保德的思維和創作態度往後發展，逐漸開拓出兩種互相連繫的方法論：一是「物理主義」，一是「機體主義」，二者均以「機械論」觀念從事地理之研究<sup>28)</sup>；外在地將現象或材料分門別類，並在其中尋求因果律或某種一般性規則。在此方法論取向下，開始了自然地理學知識的建構和發揚。洪氏的思維純粹是以自然世界為其對象，研究之對象均化為「客體」，然而，地理學界的後之來者，却亦多有以此種方式從事人文地理的研究，擬於人文世界中抽繹出普遍性法則或模式，以外在動力因來說明人

<sup>25)</sup> 阿宏，「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頁205-306，齊力、蔡錦昌、黃瑞祺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75年。

同註23。

<sup>26)</sup> 嶽勝雄，「地理學思想史」，頁95-96，六國出版社，67年。

James, P. E. 「地理學思想史」，頁140-144，李旭旦譯，商務印書館，71年。

<sup>27)</sup> James, P. E. "On History and Theory", pp.13-16, 1971.

<sup>28)</sup> Buttin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pp.18-19, 1974.

文世界的現象，而且完全忽略「人」做為「主體」的重大意義。

與洪保德單元思維的心態取向不同，李特爾同時深受基督神學、自然哲學、自然科學以及觀念論等四系理念的薰化，在其知識論背景中揉和成一個獨特的觀念系統，即融合目的論、經驗論以及歷史主義為一體的方法論系統。

就做為一名科學工作者而言，李特爾主張地理學知識的建立，應由經驗觀察入手，與洪保德一樣，強調直接地觀察現象和材料，予以分門別類，找出形態，並歸納出一般性的定理或規律。易言之，在對地理現象、材料的搜集整理之工作方面，李氏謹守著一名科學工作者的經驗論態度。僅就此點而言，李特爾似與洪保德無何差別，但彼等之同亦就僅此一點。

洪保德是一自然主義者，李特爾却懷抱著強烈的目的論信念。雖然，從表面上看，洪李均一致同意世界乃一大機體，其中蘊含著秩序與規律，即「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對洪保德來說，此只不過是「自然」而已，但在李特爾看來，世界之所以如此，乃是由於「上帝」之旨意的緣故<sup>29)</sup>，在其一切地理著作以及學術演講中，李氏均不忘推尊世界的創成和存在乃是「上帝」神聖崇高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領會到一個神聖計劃的存在，從而能把他的生命適應於它，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的賦予<sup>30)</sup>。在此，而在其思維態度中樹立了「人」的「主體性」；進而與觀念論和歷史主義的立場連為一體。茲陳述於下：

李特爾除了崇信基督教義，相信山河大地的存在展露著上帝的神聖莊嚴之外，彼亦服膺觀念論，特別是黑格爾觀念論的哲理。黑格爾觀念論的最主要特色在於主張世界和歷史乃是「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的自我辯證的展現。換言之，黑格爾的理念中預設著明顯的目的論的架構：歷史和世界（其實就是一體）的發展乃是宇宙絕對精神的辯證過程的呈現；此過程是「絕對者」之表達它自己，其終極之境就是此「絕對者」的最完美精神和形式之具現<sup>31)</sup>。

基於基督教目的論和黑格爾觀念論雙重的影響，由於世界乃是「上帝」或「絕對精神」的自我辯證之發展，因此，世界之做為一種存在，便蘊含著兩種精神：一是「內在的關聯性」，另一則為「總體性」；因為終極地說，世界的每一現象和材料均關聯於「上帝」或「絕對者」，所以彼等亦應內在地互有關聯，同時也由於世界乃是「

29) 西方中世紀的人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將世界看成是上帝的傑作，一切必合乎上帝之旨意。參考：

Mills, W. J. "Metaphorical Vision : Changes in Western Attitudes to the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2, No. 2, pp. 237-253, 1982.

30) 同註 26 , James, P.E. , 頁 160 。

31) 關於黑格爾觀念論，參閱：傅偉勳，「西洋哲學史」，頁 459-489，三民書局，73 年 7 版。

上帝」或「絕對者」之目的因的展顯，所以必然是一種「總體性」的存在體。此二者融合為一而在「區域」的範疇中彰明出來，李特爾根據這樣的目的論與觀念論的理念，主張地理學之研究在於觀察探討由人文和自然兩重世界互相作用而產生的「區域」之內涵或實體，地理學者應就「區域」內自然、人文的現象、材料之中尋求其內在的關聯，由此進一步把握其「總體」的內容。復次，不論是從目的論的立場或黑格爾觀念論的角度，世界之形成均是超越性的目的因之辯證性的歷史發展，於此預設了世界順著時間之流域或歷史脈絡而辯證地前進以逐漸臻企於美善之境的理念，基於這種思維，在李特爾來說，「區域」（複數）的歷史發展階段自有不同，其「美善」的境界當然也隨之有異，換言之，李氏強調「地理」與「歷史」實無由分開，從一個「區域」的歷史階段中追尋出該「區域」的人文水準，了解其文明程度，正是地理學思維世界的進路，在此隱喻了「區域獨特性」的觀點<sup>32)</sup>。

## （二）由徐律特到卡爾邵峨的「景觀形態論」

「景觀學派」（又稱「景域學派」）（landscape school）是一頗具歷史的地理學派別。1885年溫默（J. Wimmer）首倡以景觀全貌為研究焦點<sup>33)</sup>。其看法被徐律特（Otto Schlüter 1872-1959）採取，且加以發揚光大，並由徐氏傑出弟子，如 Passarge、Waibel、Bobek、Lautensach、Banse 等時賢碩彥提倡傳承，在歐陸地理界逐漸佔有重要地位。此派觀念後由卡爾邵峨（Carl O. Sauer 1889-1975）引入美國予以發揚，而在美國創建了頗負盛名的「柏克萊學派」（Berkeley School），以「文化景觀形態論」著聞<sup>34)</sup>。

本節擬透過此派的歷史傳承，特別是注目於徐、邵二氏的思想以了解「景觀學派」的地理學方法論。

就徐律特而言，地理學研究的重心應置於一個區域的獨特表徵上面，而此獨特表徵乃是由該區域內許多特徵相互關聯所形成的景觀構成。徐氏所謂「景觀」，固然區分為「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但在實際上，其重點並不在前者，而是著重在一個區域如何經由文化的介入和影響之下，逐漸從原來的自然景觀轉變成文化景觀。在徐氏看來，自然景觀只是人在區域中生活以及創造文化之背景，其角色是被動的、

<sup>32)</sup> 關於李特爾的地理學思想，參閱：嚴勝雄，「地理學思想史」，頁104-113，六國出版社，67年。

James, P. E. "On History and Theory" pp.15-17, 1971. Buttin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p.18, 1974. Rose, C. "Wilhelm Dilthey'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 Neglected Heritage of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Geography" Geography Ideology and Social Concern, pp.99-133, 1981.

<sup>33)</sup> 同註 26, James, P. E. 頁 216。

<sup>34)</sup> 同註 32, 嚴勝雄，頁 216-219, Rose, C. pp.113-115。

消極的，隨著時間之流而日漸消滅的；與此相對，文化的植根和創化所形成的「區域的獨特性」，在文化景觀形態中的展顯，才是終極關懷所在。

基本上，徐律特是一名「新康德主義」的服膺者，其理念主張二分的科學觀，即認為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思維進路應各具特色而不必相同，以研究區域景觀形態之獨特性的地理學而言，徐氏反對以尋求因果相關或普遍性規律為目的的自然科學思維方法。做為一名「新康德主義」的信仰者，其地理學方法論遵循兩條路線，即：「文化形態論」和「歷史主義」的路線。換言之，地理學者依循並省視一個區域的歷史脈絡，而將該區域的文化如何把該區域從自然景觀轉變成文化景觀所形成的獨特表徵加以詮釋、彰顯，就是其所揭舉的方法進路。

雖然徐律特強調地理學只專注於景觀形態的研究，而對於非物質性的、精神層面的文化現象，如社會、宗教、經濟等排除在外，但此並非否定此等現象之做為解釋文化景觀構成的脈絡性，易言之，在實際上，徐氏只是反對以「系統科學」做為地理學研究的領域，却未反對這些「系統」在一個文化景觀形態的形構時所佔有的內在意義上的份量，因此，根據嚴勝雄在「地理學思想史」一書中所指出的，徐律特在尋求一個區域的文化景觀的解釋時，最重視「思想與民族性」<sup>35)</sup>，此即意謂一個區域的獨特性乃是由該區域內活動的人之思想及其文化系繩、歷史傳統等型塑而成，在此蘊含著從文化歷史脈絡中來探索把握一個區域的人文景觀的立場，對徐律特的此種立場而言，正是其服膺實踐「觀念論」應該出現的寫照<sup>36)</sup>。

徐律特的思想經由後繼者 Waibel、Schmieder 等人的承襲和轉化，促使文化景觀形態論更加重視「歷史的詮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以及人做為區域的主體所擁有的「人文力量」，此種趨勢使彼等更傾向一個區域文化景觀的「深層意義」的發掘和詮釋，甚至更出現了班斯（Banse 1883-1953）強烈的反理性、十足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式<sup>37)</sup>的文化景觀方法論，班斯認為「景觀」的意義詮釋不應探

<sup>35)</sup> 同註 26，嚴勝雄，頁 194。

<sup>36)</sup> 同註 35，頁 186。

Rose, C. "Wilhelm Dilthey'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 Neglected Heritage of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Geography", *Geography, Ideology and Social Concern*, pp. 99-133, 1981.

<sup>37)</sup> 存在主義地理學援引在主義哲學，強調人作為一個「在世存有」的心靈主體，直接面對其所經驗的生活世界而產生的「主體性」或「主觀性」的地理學，站在這種立場，他們反對客觀的科學主義地理學，也反對把人當作「純理性」的存在，而認為人應該是心靈的或精神的整全性的存在。關於存在主義地理學論文，參閱：

Samuels, M. S.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Geography"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pp. 22-40, 1978. Samuels, M. S. "An Existential Geography" *Themes in Geographic Thought*, pp. 115-132. 1981.

用「理性的考察」，而應採行所謂「內在經驗」（inner experience）的法門，研究景觀，要由此法門以超越單純認知和描述的方式而深契至區域的「精神」中<sup>38)</sup>，換言之，經由直接的生活體驗以攝握一個區域的文化生命及其歷史本質，方能由此了解該區域文化景觀的真實性、根極性的意義內涵。

開創「柏克萊學派」並傳揚「文化景觀形態論」（Cultural landscape Morphology）的卡爾邵峨在根本理念上反對以「理性論」（Rationalism）和「實證論」的思維態度處理地理學對象。邵峨提到從十九世紀以降，由於理性論和實證論思潮一時極盛，在地理學方法論中儼然執行其牛耳，「神聖法則」（Divine Law）被「自然法則」（Natural Law）取代；地理學者欣趨於地理事實中尋求「普遍性法則」，並喜以「普遍性法則」來說明地理事實。此種取向樂於化繁為簡，依重數學、物理模式以說明原本複雜多變的世界。在此趨勢下，地理學者多以動力因的思維角度來探究地理事實的因果相關公式而已，「環境決定論」、「輪廻說」、「演化論」均屬此中典型。復次，由於工商活動日趨頻繁，對於情報資訊之取得愈顯急切，順應這種狀況，更促使地理學的研究走向計量的、空間模式的、系統理論的、抽象的、假設的、預測未來的，以及非歷史的方面，邵峨認為在此種走向下，「真實的地方與時間的性質」遂被消褪，地表上具體存在的自然的、生物的以及文化的豐富差異內容遂被忽視<sup>39)</sup>。邵峨不客氣地批評此種思維方式乃是一種「將區域關聯之繁賾豐富的世界實體化約為粗糙的唯物主義宇宙論的獨斷式教條」<sup>40)</sup>。邵峨強調從「理性論」、「實證論」出發，以「自然法則」為模式的這種思維心態，實無足以研究人之群體和社會的現象。

事實上，在卡爾邵峨看來，地理學的最高境界實應超越於科學之上（beyond formal science）而達於「藝術之境」。彼認為真正優美的區域地理乃是一種精緻的「表象藝術」（representational art），而此種創發性藝術是無法用分類或科技方法下定義予以界說的。彼強調區域的文化景觀即是一種「美之形態」，甚至當人們面對此「美之形態」時，不應依社會科學的態度去思維、去探索，而應該懷抱道德的情操<sup>41)</sup>。邵峨呼籲最佳成就的地理學永遠不要忽視了景觀中蘊含的「美之品質」（esthetic qualities），彼特別舉出一些地理學大師級人物的地理學認識論理念以說明彼等之超越科學而進入藝術之「創發性境界」；並提到他們均能在地區的景觀中之凝

<sup>38)</sup> 同註 36, Rose. C.

<sup>39)</sup> Sauer, C.O.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4, No. 2, pp. 189-192, 1974.

<sup>40)</sup> Sauer, C.D.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Land and Life, p. 320. 1963.

<sup>41)</sup> Sauer, C.D. "The Education of a Geographer" Land and Life, pp. 403-404, 1963.

視和沈思裏發現「交響樂般的品質」( symphonic quality )<sup>42)</sup>。

卡爾邵峨的此番謙論，實非絕響，約翰哈特 ( John F. Hart ) 在題為「地理學者的藝術之最高形式」一文中呼應闡揚了邵峨的見解；哈特根本主張區域地理的創作是地理學最高的表現形式，其目的在於闡明詮釋一個地區的文化獨特性，而使世人瞭解認識該地區的人文活動所構成的價值，哈特強調這樣的進路是藝術創發的過程，易言之，對於「區域」的認識，在哈特說來，應屬「主觀藝術的設計」( subjective artistic devices )，而不能僅僅是一門科學的工作<sup>43)</sup>。

其實，不論是約翰哈特或卡爾邵峨，彼等所謂「美」的取向，或「藝術」的取向，在本質上，即是「價值判斷」或「意義抉擇」。對一個區域的內容進行價值判斷或意義抉擇，就邵峨而言，乃是由一個區域的文化景觀之文化和歷史的脈絡入手以尋求對此文化景觀形態之意義瞭解。如同徐律特之地理學認識論，卡爾邵峨認為地理學的研究焦點是置於一個區域中，由於人文（文化）的作用力，再經由歷史時間的發展，從自然景觀逐漸型塑出一個文化景觀；而這個「文化景觀」正是「地理區域中最終極的意義」(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geographic area in the final meaning )<sup>44)</sup>。自然世界在邵峨的觀念中，扮演的是一種背景或媒介的角色，相反地，「人」（或應該說是「文化」）才是世界的主角，由文化形構而成的人文世界方為地理學思維關懷的主體，邵峨說：「當然，自然景觀在基礎上言是重要的，它提供了物質根基，而文化景觀因之得以形成，然而那型塑的作用力却是文化。」<sup>45)</sup>「文化」由何而來？邵峨直截地說是來於「人之心靈」( mind of man )<sup>46)</sup>，換言之，文化景觀固然建立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但其源始力却是「心靈」，在此十足表露了卡爾邵峨的「觀念論」的思維方式。

尼古拉斯·恩特瑞肯在其一篇討論卡爾邵峨的哲學理念的論文中<sup>47)</sup>，雖然認為邵峨具有多種甚至互剋的哲學理念，如自然主義、實證論、觀念論、實用主義……等；同時也對某些「人文主義地理學者」以邵峨為一人文主義地理學者之看法表示懷疑和反對，但恩氏却也承認「新康德主義」對邵峨的地理學方法論提供了哲理之源泉活水

<sup>42)</sup> 同註 40, p.344。

<sup>43)</sup> Hart, J.F.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2, No. 1, pp.1-29, 1982.

<sup>44)</sup> 同註 40, p.342。

<sup>45)</sup> 同上, p.343。

<sup>46)</sup> 同上。

<sup>47)</sup> Entrikin, J.N. "CARL O. SAUER Philosopher in Spite of Himself",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74, No. 4 pp.387-408,

。如果由邵峨的兩篇重要的思想性論文——「景觀形態學」和「歷史地理學緒論」所彰明的觀念來看，在次要的手段上，或許仍含有經驗論、實證論的某些成份，但在其終極性的思維進路，却無疑地顯露著一個「新康德主義」的思想之服膺者色彩。如同新康德學派所標舉的對人文世界的思維態度，邵峨的方法論中結合著三種面向，並由此三種面向形構出地理學的最中心的意義或價值核心，此即「文化景觀」。這三種面向為何？即：文化、歷史和區域。邵峨說：「區域研究蘊含著時間的深度……，其自然背景受人文作用力的型塑，而發展的方向則訴諸各式各樣文化的擇取，人文地理即是使於對一個特定的空間之文化經驗的瞭解……」<sup>48)</sup>。彼又說：「時間向度是地理瞭解的一部份，人文地理將人視為地理的作用力；人運用其技術、依其需求，而在無可回溯的時間之流中改變並利用其生存環境」<sup>49)</sup>。文化景觀形態論就是主張地理學者研究人文世界時，由區域的文化景觀入手，運用田野調查、文獻研讀等工夫，而能追溯其歷史起源和脈絡，並掌握其文化整合體的獨特性；由文化個體在區域中的源生、延伸、複合之過程到一個整合的文化景觀形態的展顯之把握，從這裏面凸顯出該區域的獨特性，於此，邵峨宣示了一個地理學的思維進路：經由區域的文化內涵和歷史脈絡的詮釋以彰顯該區域文化景觀的內在意義。對邵峨而言，人文地理即是文化、歷史地理；文化和歷史所建構的內在意義撐舉的文化景觀即是一個區域的本質。

邵峨在「歷史地理學緒論」的結論中特別再三強調多元發展的文化與此多元發展的文化所呈現出來的多元發展的歷史，此二大多元的面向在地表上逐漸塑造出豐富繁饍、多采多姿的文化景觀，而這些多樣的文化景觀整合出來的區域差異性，也就是區域獨特性，正是地理學家凝心關注之所在。<sup>50)</sup>

### (三)白蘭士的「生活方式」觀念

法國哲學家孔德 ( Comte 1798-1857 ) 建立了所謂「科學的社會」，尤其是物理學的方法論為模式，主張社會也如同自然，具有一套「永恒不變的法則」，追尋並掌握此「法則」，將可獲致對人類社會之瞭解，「瞭解以便預測，預測以便控制」，如此而達到人類文明的極致<sup>51)</sup>。

涂爾幹 ( Durkheim 1858-1917 ) 繼承這樣的社會學方法論，並由此建構「社會

<sup>48)</sup> Sauer, C.O.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4, No.2, 1974, pp.189-192.

<sup>49)</sup> 同上。

<sup>50)</sup> Sauer, C.O. "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Land and Life*, p.378, 1963.

<sup>51)</sup> 黃瑞祺，「社會學的三大傳統」，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頁7-50，巨流圖書出版公司，74年2月。

形態學」（Social Morphology），認為社會現象乃一客觀實存的實體，學者以追求其客觀實存的「法則」為職志。由於接受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影響，其等的社會學典範以為社會世界就像自然世界，「本來就在那裏」，在其中必然如同自然世界一樣，含藏著客觀、普遍的「法則」、「規律」，學者探究社會，其目的即在於獲得此最終極的「法則」、「規律」<sup>52)</sup>。

實證論社會學之所以採取如此觀點，乃是「得之於他們對『科學方法』的信心，……他們以自然科學當作社會科學的典範，處處與自然科學比附，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或了解）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本質相同，而是他們相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具有相同的『邏輯結構』——包括研究程序的邏輯與理論的結構。……因此實證論者大都提倡所謂『方法的統一』<sup>53)</sup>」。如上所述，「社會形態學」秉持的就是此種「一元的科學論」，認定科學只是一條路線的向頂峰邁進，照孔德的說法，人類思想的進化是由神學而哲學而科學；在科學之中又以數學、物理學為極致，所以，所謂「邏輯結構」的相同和「方法」的統一，其實乃是以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為唯一的方法論；依據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物理學的思維模式來處理人文世界。

近代地理學思想大師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8-1918）與涂爾幹同屬法國人，並且同為一個時代的著名學者，對於世界的思維態度，彼與涂氏全然異趣。基本上，白蘭士明顯地抉擇了「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在他這種立場，人思維世界時，其心靈和思想才是「主體」，換言之，世界現象或事實的資料，必須經由人的思想心靈之思維建構之後，對人而言方其存有的意義，亦即，通過思維，世界才被說明和解釋。基於如是觀點，白氏反對任何化約的、決定論的、獨斷的科學觀，白氏及其後繼者大體認為人對世界的認識，實在是人以自由意志或以心靈的主體性活動經驗了各種現象事實之後，對此等現象事實加以主觀上的緝合和建構而產生者，此意謂：並無所謂「客觀的世界」可讓人加以掌握，一切對世界的認識，均屬人類對世界進行某種形式的解釋系統，而這些系統有其時空背景，本具多方面的差異，因此並無單一的、全稱式的而足以完全涵蓋包絡世界實體的解釋系統或理論。易言之，白蘭士不認為「科學」是「一元」的，他主張多元發展的科學觀，基於此種信念，白氏拒絕承認有所謂「絕對的實體」，他認為人只能提出對於世界思維的「觀念」、「想法」、「原則」等，却不是「獲得」世界之本身。

52) 蕭新煌，張芷雲，「對國內社會學經驗研究的初步反省：現實建構、理論與研究」，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頁 267-295，71 年 7 月。

53) 黃瑞祺，「功能論與實證論—功能論理論基礎的反省」，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頁 215-238，臺北巨流圖書公司，73 年 3 月。

從上述的理念出發，白蘭士強調多元的、相對的價值；著重事物與事物延續連繫的探討，而非事物與法則關聯的研究。基於此，白氏在面對地理現象時，自然落實在多元的、相對的「區域」之研討和詮釋上，在他而言，並無「絕對區域」之存在，亦即並無任何全稱式、普遍式的法則可以說明所有的區域，相反地，白氏傾其關懷於區域的個體性、特殊性、珍貴性和創造性的闡釋和彰明，從此處，白蘭士建構了他的區域論：「生活方式」（*genre de vie*）的觀念<sup>54)</sup>。

所謂「生活方式」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所學習到的傳統品質，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複合體<sup>55)</sup>，這個複合體，經過一段歷史時間的演進，在區域內和當地的自然條件整合之後，所獲致的反應和產物，而在該區域整體地呈現出來，成為該區域的獨特性<sup>56)</sup>。換言之，「生活方式」乃是自然、人文、歷史等三大面向在一個區域中的整合展顯，或者是三大面向整合展顯成為一個區域。而自然條件只是一個區域的舞台或背景，其對人文而言，是一種限制，然而，一個區域的「個性」的創造者，却是人類；是人類以其文化作用力去變化了區域，再經過歷史時間的脈絡傳統的演化遷流，最後融合了自然——人文而為一，並由此展現了一個區域的特色。因此，在白蘭士的地理學思維態度上；作為創發力的文化固然塑造了區域的傳統，就是自然變遷之研究亦需由該區域的文化對世界之價值取向中尋得理解。由於文化是經由人之內在性存在意義所創造出來的，所以，白氏事實上是把「人的創造力」（*human creativity*）置於最高的地位<sup>57)</sup>，換言之，「生活方式」除了展現為物質層面的現象之外，更重要的是蘊含在內面，屬於精神層面的存在，這便是「意義」、「價值」、「思想」、「心靈」、「信仰」……等<sup>58)</sup>。所以，對於一個區域的獨特性之把握，乃是從該區域之「生活方式」的詮釋著手，而欲深入詮釋「生活方式」，則需瞭解其歷史脈絡的傳承下，人文如何相融自然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又由於「人文」（或「文化」）的源始乃來自人類內在的精神，所以溯源求本之道更在於對該區域的民族之「價值系統」能夠予以把握，獲得正解，如此方能對其「生活方式」，加以詮釋，而「區域的獨特性」也方能得到彰明。安娜·布蒂茉（Annette Bu-

<sup>54)</sup> Berdoulay, V. "The Vidal-Durkheim Debate"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pp.77-90, 1978.

<sup>55)</sup> James, P.E. 同註 26，頁 232。

<sup>56)</sup> Buttiner, A. "Charism and Context: The Challenge of La Géographie Humaine"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pp.58-76, 1978.

<sup>57)</sup> 同註 54，p.87

<sup>58)</sup> Sorre, M. "The Concept of *Genre de Vie*" *Cultural Geography* (Wagner, p. and Mike-sell, M.) pp.399-415, 1962。

ttimer)在「地理學的價值」一書中論及白蘭士學派的思想時，對此便有推崇的著墨<sup>59)</sup>。

#### (四)由赫爾特納到哈子宏的「區域整合體」

赫特納(Alfred Hettner 1859-1941)界定地理學為「區域的科學」(chorological science)，乃是將地理學研究的焦點置於「地誌學」(Chorology)上面，是將地表視為地理現象的差異和關聯的呈現狀態，亦即是事象在區域中的「填充」，然而此並非意謂地理學的處理方法只是將區域的事象平鋪直敍，如一大堆雜碎的拼盤，其本義在於一個區域內各種事象非孤立、散亂地存在，而是互相關聯作用著，包括了自然的以及精神生活的各層面整合成為一個區域的「個性」；地理學就是追求這個「區域個性」的科學<sup>60)</sup>。

事實上，由於赫氏長期任教於著名的海德堡大學(1899-1928)<sup>61)</sup>，海大正是「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中心，他浸潤於此學風之中，尤其是受同校的文德爾班和李克特兩位哲學大師的影響，因此乃提出了其特別的科學觀，此觀點明顯地反對實證論科學觀而傾向於「新康德學派」的觀念。茲陳述於下：

赫氏在其巨著「地理學」(DIE GEOGRAPHIE)一書中，明白地反對「一元的科學論」，而認為由於科學的範圍日益增長，早已導致分裂和割分，彼強調「每門科學必須有它確定的獨特的內容，它使用確定的獨特的方法處理這種內容，並用確定的獨特的方式傳授這種內容」，基於這樣的看法，赫氏主張科學有兩大面向，即：「抽象的科學」與「具體的科學」。前者是剝除事物之個體的及特有的特徵，而只去尋找出普遍的性質，由此獲致一般性、全稱式的規律法則；後者則是就現實存在事物的個體特色及其時間、空間的差異來研究出其獨特的意義。關於後者，赫氏再予以區分為三類，即：「現象親屬系統的科學」，即專門探討事物類屬的科學；「時間系列的科學」，即歷史學；「空間關聯的科學」，即地理學。

站在這種立場，赫特納強調地理學乃是一種「追求個性」的學問。彼之思維方式，正與李克特的見解一致。在地理學上追求個性，就是攝取彰顯「區域獨特性」的意思。在此取向下，赫氏認為地理學者也應考慮「時間」，也就是「歷史」的因素，他固然主張「地誌科學」應與史學區分，但也承認區域事物的關聯，在詮釋時需要追溯其發展過程，而其實況，需透過較長時期的考察方能獲知。換言之，赫氏的「地誌科學」，事實上乃是建立在「區域」、「事象」和「時間」等三大面向的，而其「事象」則包含了自然、人文乃至「精神生活」等方面。

<sup>59)</sup> 同註 28，pp. 19-21。

<sup>60)</sup> 同註 26，嚴勝雄，頁 175-185。

<sup>61)</sup> 同上。

雖然赫特納不反對應用抽象式法則來說明某些地理現象，但他却特別強調此類法則往往無法詮釋或有意忽略「個體」的特殊性之意義，他特以「峽灣」為例，縱然由抽象科學的方法而得出關於「峽灣」的普遍性規律，它也無法表彰出地球上任何某一峽灣的自己之獨特面貌及其意義，同理，對於人文現象，如人之聚居，也面臨相同的狀況，赫氏由此標舉出地表存在的事物往往擁有個別的、重要意義，「地誌科學」，也就是「地理學」的要務，在赫特納看來，即是要抉發彰顯出個別的區域之內在性意義，亦即該區域的個性之表彰<sup>62)</sup>。

理查哈子宏（Richard Hartshorne 1879-）是赫氏方法論在英語地理學界的發揚光大者。在一篇題為「從康德、洪保德到赫特納的空間科學之地理學概念」的論文中<sup>63)</sup>，哈氏闡釋赫氏「地誌科學」的基本理念，並追溯本於大哲康德，然後重申了與赫氏一致的地理學概念，即地理學的研究焦點應置於區域中各現象的複合所形成的整體特徵的瞭解，而該等現象包括了自然與人文，但並非指地理學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也不是這兩者的橋樑，地理學乃是整合該兩大現象之後，把握區域獨特性、統一性的學問。

哈子宏的思想，實乃一脈相承於赫特納，對於「科學」性質的認知，兩人可以說是本源無異，根本上都屬「新康德主義」的服膺者。茲以哈氏巨著「地理學性質的透視」來掌握其觀念<sup>64)</sup>。基本上，哈子宏接受「兩元的科學觀」，主張有所謂「法則的科學」和「描述個體的科學」之分。哈氏堅決反對「一元科學」的心態，亦即反對「科學只以尋出普遍性法則為目的」之論調，他批評說：「某些人斷然以科學法則的形成作為科學的終極目的，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它顯然堅持中古學院式的實在論。它的最後意圖是闡明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在闡明以前就已被看作一項信念，包括人類的決心和行動在內的所有現象，最後都可用不偏不倚的法則加以解釋。……這不是科學中可用的假設，而是不能證明的哲學假設，把這個假設的闡明作為科學之目的，就使所有的科學變成哲學的僕人」。於此，哈氏嚴厲地攻擊了「實證論」的科學觀，認為此觀乃是某種獨斷論的哲學意識形態。

依據哈子宏的看法，所謂「科學」，乃是學者對其研究的對象所進行的「認知的

<sup>62)</sup> 關於赫氏如上述論的思想見：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頁 128-181 與頁 239-262，王蘭生譯，72 年 5 月。

<sup>63)</sup> Hartshorne, R.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8, No. 2, 1958.

<sup>64)</sup> 哈子宏，「地理學性質的透視」，黎樵譯，商務印書館出版，70 年。本文根據其中第十章「地理學企圖建立科學法則還是描述個別事例」，第十一章「地理學在科學分類中的地位」，頁 145-180。

描述」(Cognitive description)，不論依賴感官的觀察或儀器的測量，只要是系統地觀測、分析了研究的對象，並且認知地描述出來，此結果，便是科學。邵峨也有雷同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的科學均為「現象學」(Phenomenology)，應視之為獲取知識的組織過程，而不應只看成爲物理法則的統合體，只要是系統地對一群現象的性質、關聯等加以說明、解釋，這過程和結果，便是科學<sup>65)</sup>。

無論哈子宏、邵峨，乃至於白蘭士、赫特納、徐律特等地理學大師，甚至可以追溯至傾向德國觀念論的信仰者，大致上均立基於如是的科學觀，他們並非反對尋求普遍性法則的思維進路，而只是反對以此進路爲唯一者、獨斷者之心態，世界上有許多個別性的事物、現象，特別是人文的個別性創造物，其本身具有主體性存在的特殊意義，在他們看來，是不能也不適合用普遍性法則說明的，況且由另一角度說，世上如此繁複多元的個體物，各有其價值內涵，其實也不可能獲致所謂的「普遍性法則」。

基於這種理念，哈子宏強調地理學不屬於「法則追求的科學」，而屬於「個性描述的科學」，著重於區域的整合體、統一體之發生、演化和形成的詮釋。他認為以豐富繁賾的生活世界爲思維對象，若以爲能獲得某種全稱式、普遍式的「法則」，乃是絕無可能的想像。雖然他並不反對系統的規律、定理的應用，但也只作爲局部、有限性的說明、解釋而已。如同白蘭士的「生活方式」思想、邵峨的「文化景觀」思想，哈子宏在其「區域統一體」的觀念中，是以人類及其文化作用力爲創造區域的主體，他認爲「在整個歷史時期，地理工作者並不把地球單純看作是一個自然體，而是一個「作爲人類之家的自然體」，換言之，對於自然世界的思維和探究，依哈氏，必須是透過文化的一種價值評估，對於人文世界的思維而言，人與文化更居於決定者的地位，因此，地理現象對不同文化、不同時期的民族或個人來說，都具有不同的意義，基於上言，「區域」的個性，乃是其自然、人文二大要素透過其文化體之所擁有的價值系統之取捨、創化而得以孕生，這「個性」之彰顯，正是哈氏之旨趣所在；就他而言，作爲「人類之家」的最真實呈現：整合了自然、人文兩大面向和內涵所形成的「區域整合體」或「統一體」之意義詮釋，乃是地理學者最高、最終極的任務。

#### 四、結論

現象學宗師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指出自從伽利略革命以來，「數學化」(mathematisation)與「理念化」(idealisation)已成爲歐洲乃至全

<sup>65)</sup> 同註40, pp.315-316。

球科學的主要特色；伽利略開創了數學化以及理念化的科學，其主要觀念主張科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穿透現象的稀薄表層，進而掌握自然界裏面可以數學化的類型。服膺者認為唯有透過數學關係，一切現象才能獲得說明，自然界整體被視為「應用數學」，只有可以用科學的理念化來描繪的世界，才是唯一的真實世界。換言之，透過一種規格化的科學語言使經驗達到完全的客觀化，乃是他們的基本理想。科學家的目的，是想把經驗翻譯為超乎個人的公式，科學家使用模式運作，其研究目的也在於設計新的模式。

胡塞爾特別指出這一種嚴重的危機，危機源頭正是此種瀰漫在現代科學中的「客觀主義的物理主義」(objectivistic physicalism)或「科學的客觀主義」(Scientific objectivism)。胡氏並非反對科學本身的「物理化」(physicalisation)，也非反對日益增強的「自然之數學化」(mathematisation of nature)的趨勢，甚至他也不反對科學的「客觀主義」本身。他真正反對的是，由這個「客觀主義」所激發出來的「自足的錯覺」，此是指謂由於「客觀化」的作用，而使「科學」失落了在人之社會中應具有的責任之意義，易言之，在「客觀化」的過程中，逐漸地把「主體的立足點」以及一切人文意義，均加以清除、淹沒了，乃至於達到「反人文」(de-humanised)態度的顛峰，成為「泛科學主義」的「意底牢結」(ideology)，彼等只相信只有一種真理典範，那便是「科學的客觀主義」或「客觀主義的科學主義」，唯一的真理語言便是「數學」。這種取向，已不僅僅是少數科學工作者的心態，事實上，正如本文所敘述的已成為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上的顯學，乃至一般通俗的思潮也以此為歸趣。胡塞爾指出這乃是失落了主體性的危機，因為此種思維心態導至「生活世界」(lifeworld)，這個「明顯易見的真理」的被遺忘。胡氏認為現代科學的高度抽象化隱藏了「生活世界」的真相，使人們忘記了這個世界乃是「我們的」世界；由於完全服膺一個全然超越個體的客觀性，因此在現代科學的規範和運作中，「我們的生活世界」的種種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文化、歷史均遭遺忘，而這種遺忘，也就是所謂「人文主義」的遺忘。胡氏呼籲應經由反省「生活世界」的存有意義來展顯其真實性，才能超克實證科學的思維所帶來的危機<sup>60</sup>。

其實，胡塞爾的憂患意識，正與本文第二章列舉的各家觀念的綜合結論若合符節，共具一種相同的人文關懷。在第二章，本文提出「浪漫主義」、「新康德學派」以

<sup>60</sup> 關於胡塞爾的「生活世界」觀念以及對歐洲科學的危機意識，本文參閱：沈清松著「現代哲學論衡」第七、八兩章，頁185-230，黎明文化事業公司，74年8月。廖仁義譯「胡塞爾與現象學」，第八章，頁137-154，桂冠圖書公司，75年3月。

Buttimer, A. "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6, No. 2, pp. 277-292, 1976.

及「歷史意識」的思想加以論述，其中特別討論到卡西勒、文德爾班、李克特、朵伊森、韋伯等思想大師的觀念，綜合地獲得他們之間的一種重要之共通。基本上，他們否定了一元的科學論，而服膺二元的科學論；前者就是「實證論」對於知識之思維和建構的態度，以自然科學法則研究人文社會，運用數學，而以獲得模式為目的，後者則從目的論和方法論的立場上反對前者。就目的論的立場而言，他們不認為對人文世界的思維和研究只是為了尋求「普遍性法則」或「模式」，其終極目的乃是在於詮釋人文的意義、表彰人文的價值，而使世人對於自身的存有性有一相應的瞭解；就方法論的立場而言，他們認為實證論的尋求法則取向的方式，根本無法詮釋以及彰顯人文的獨特性意義和價值，在這裏事實上隱含了他們與實證論大相逕庭的認識論，就實證論者來說，是把世界「凍結」地看待的，彼等只有抽象概念、普遍概念、模式概念、非歷史概念，與此恰好相反，本文論列的反實證論者們，他們著重於人文世界豐贊多元的具象事實之存在性，特別留意於個體之存在尊嚴和意義，並且強調人類的文化傳承和歷史脈絡，而這樣的文化歷史傳承脈絡，就是凝塑出多采多姿的人文世界之價值系統，在空間上便表現出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的「區域獨特性」，對於人文世界的研究，正是為了彰明它的多采和繁贊。

與「新康德學派」、「歷史學派」等思想派別約在同一時代，亦即十九世紀後半葉，共同產生於歐陸，特別是德、法兩邦的地理學，在其方法論和哲學信念上，明顯地看出具有一股反實證論思想的流脈；綜觀：李特爾的目的論及觀念論取向的地理觀念、徐律特——卡爾邵峨一系的「文化景觀」論、白蘭士的「生活方式」論，以及赫特納——哈子宏一系的「區域獨特性統一體」論，乃可發現抉擇了「詮釋彰顯以人為主體，由文化歷史脈絡所建構而成的區域之價值內涵和存在意義」的地理學思維進路的地理學派，其實是一條方法論上的長河，而且其勢實未嘗斷絕，更重要的是有著一種「吾道不孤」的氣象。雖然，由於英美經驗——實證論取向下的，尋求法則模式的，所謂的「科學的地理學」，挾著科技滲透宰制觀念系統的強勢，而在地理學方法論上一度十分顯學，然而提揭「文化、歷史的人之區域」的精神之地理學思維信念，仍然服膺觀念論的觀點，以個體區域的獨特性為其研究、表彰的對象，此種精神一直向前延續開展，自七〇、八〇年代以降，繼承這種學脈，而更進一步拓建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結構論地理學」，甚至與「詮釋學」(hermeneutics)、「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等思潮互相湊泊所引生的方法論上的省思和批判<sup>67)</sup>。決定地理

<sup>67)</sup> 手頭上所有的，專文討論到「結構論」、「現象學」、「詮釋學」乃至於「批判理論」與地理學方法論之關聯的論著為Derek Gregory所作的“ Ideology ,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

的主體，不僅僅已非所謂的「自然法則」，也不僅是「人的理性主體」，今天的地理學者已經（同時，也應該）重視人之其他心靈質素，如美感、道德情操……等，在地理內涵上的影響。總之，地理學，無論反省其歷史或瞻望其未來，都不只是一門實證科學而已；蘊含於其內面的「人文學」（*Humanities*）精神，毋寧是更值得去加以珍惜表彰的寶貴資源。